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深圳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杜芳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广东深圳 518055)

[摘要]深圳地处“两个前沿”,其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成效对于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后,针对深圳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圳共产党人综合施策,多措并举,从制度保障、理论武装、价值塑造、阵地建设、网络治理入手,强化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新时代党在深圳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具体实践中凸显了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结合、风险防控与价值引领结合、本土传承与国际传播结合等显著特征。

[关键词]意识形态领导权;新时代;深圳;风险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 D26; D64; D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24-0120-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24.042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深圳地处“两个前沿”,其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成效对于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有缺失的地方,必然难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个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有疏漏的地方,必然难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深圳面临哪些风险挑战?针对这些风险挑战,深圳采取了哪些举措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新时代党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深圳实践呈现出哪些主要特征?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一、风险图谱与现实困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深圳的多元挑战

识别和研判深圳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是新时代深圳共产党人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进入新时代后,其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方面面临哪些风险挑战呢?

(一)深圳实践维度:超大城市治理风险传导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根据深圳市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底,深圳市年末常住人口1798.95万人。作为拥有如此人口数量的超大城市,其社会治理面临着“压缩型发展”带来的“叠加性风险”,这种“叠加性风险”极易传导到意识形态领域。一是民生问题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圳市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基础教育学位供给、医疗资源均衡化等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高房价、学位紧张、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依然是客观存在的治理难题。当年轻群体和新市民在这方面面临巨大压力时,就可能从对具体政

策的不满,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社会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理念的质疑。二是劳资关系张力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非公有制企业占比显著,市场经济高度活跃,劳动关系复杂。个别民营企业存在的超时工作现象严重、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问题,一旦借助社会热点在网络上发酵,容易诱发大规模非理性表达和群体极化。这类事件在算法推荐机制与流量经济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可能引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甚至对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曲解和攻击。

(二)国际环境视域:大变局下深圳面临的制度博弈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剧增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趋势加速演进。西方国家不甘心昔日霸权的旁落,必然会处心积虑对中国设置各种障碍,发动对我国科技、贸易、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打压。2019年,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党中央赋予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地位,要求其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2035年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全球标杆城市。党中央对深圳的这一期待本身就意味着,深圳的成败不再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问题,它已经上升为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效的重大政治问题。这种高期待既是深圳不断前行的动力,也给深圳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中西关于制度的较量和博弈下,深圳处在最前沿的交锋点,深圳的试错空间被大大压缩。深圳在探索中一旦出现任何较大经济波动或者重大社会矛盾,都极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并无限放大,将其炒作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失败”,深圳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增加。

(三)意识形态场域:深圳多元社会思潮对主流价值的解构风险

深圳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毗邻港澳,与国际经济、政治、

收稿日期:2025-9-2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YJA71000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深圳实践研究”(项目编号:GD23XXY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芳(1975—),女,陕西洋县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文化自信研究。

文化联系紧密,西方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往往以深圳为跳板逐渐渗透到内地。进入新时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主义等多样化思潮往往借助深圳海关、网络平台、文化贸易、学术交流、宗教传播等途径进入深圳。近几年,青年亚文化对深圳青年也有一定冲击。高房价、快节奏使“深漂”青年大量聚集在城中村、公租房,形成“蚁族”“社恐”“躺平”等亚文化圈层。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不一定全是负面影响,它们的存在也会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包容、调适和完善,但有一些负面的、片面的社会思潮会直接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这对深圳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巩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四)新技术发展层面:算法推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已经迅速进入到一个“以算法为中心”的时代。“算法技术并非价值无涉的纯粹运算程序和配置范式,在数据的收集分析、算法推荐以及算法决策中都显现出复杂的意识形态功能、价值面向与权力意图。”深圳作为国内重要的电子信息和数据产业基地,除了遵守国家关于互联网技术、算法推荐方面的法律法规,深圳也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等。即便如此,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深圳在算法推荐方面或多或少还是会存在数据盲区、模型盲区、协同盲区、语义盲区等。算法推荐技术通过制造“信息茧房”,把不同人群封闭在各自的认知气泡里,由此削弱了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共同体验与自觉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悬浮”的风险。另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给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带来了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内容不仅包括文本、视频、图像、音频等样态,也隐含价值、理念和逻辑。在传统“把关人”缺失的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制造了大量虚假信息,“而虚假信息往往触及热点或博取眼球被算法推送至信息前沿,能更快速实现资本增值,在真假难辨的信息场域下,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噪音更多,引领的难度更大”。

二、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深圳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对策

面对上述风险挑战,面对新时代深圳肩负的“双区”建设使命,深圳中国共产党人以守正创新为原则,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探索出具有示范意义的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实践路径。

(一)坚持立破并举、强化责任落实,借力制度铸牢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立规矩。针对党的十八大前,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的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制定并印发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部署,深圳市委办公厅制定了《深圳市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制度与配套机制,分别强调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另外,深圳市还建立了相关机制,通过述职、巡察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党组)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责任。这些制度压实了深圳各级党委(党组)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让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抽象原

则转化为可感知、可量化、可问责的日常治理实践,确保了主流意识形态不被任何异质叙事侵蚀,牢牢守住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南大门”。

(二)坚持“两个结合”、强化理论武装,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向全党和民众宣传普及。在中央和广东省委部署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相关活动后,深圳市也及时召开了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走在前列、勇当尖兵”。为了推进主题教育,深圳市委组织了主题教育读书班和研讨班,要求“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另外,深圳还把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解决民生问题深入结合起来,打造“@深圳—民意速办”民生诉求服务一体化平台。主题教育和民生诉求解决相结合让民众感觉到主题教育不是“一阵风”,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持续的民生温度。

(三)价值内化、行为转化,在知行合一中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政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也体现着这个政党的德。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印发后,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迅速落实和部署。首先,通过户外广告牌实现视觉占领。深圳重视每一个户外的广告阵地,各区通过制作、投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公益广告,使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随处可见,抬头可读,形成“抬头即核心价值观”的沉浸式场域。其次,通过不断推出各种文艺精品,在实现情感占领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心、落地的催化剂和“黏合剂”。《青春的名义》《寻》《青春之城》等深圳作品始终贯穿着“敢闯敢拼的青春激情”和“与城市共成长的家园认同”的情感主线。情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墙上的标语”变成“心里的应该”,从外部命令转化为内部驱动。深圳还通过各种暖心行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每到春节,一票归乡成为普通民众的一大难题。市文明办、市关委办联合多个部门开展“温暖回家”“爱心年夜饭”“感动深圳”“圆梦计划”“寻找需要帮助的人”等关爱活动及项目。这些实际行动让友善和关爱在深圳随处可见,核心价值观不再是标语,而是可供反复验证的民生实惠。深圳各级政府部门把工作做实做细,必然能赢得民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四)突出阵地意识,在构建全领域覆盖、全链条贯通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中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要有阵地意识。在领导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就强调阵地意识的重要性,“任何一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基础上,提醒全党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深圳市委建立了覆盖线上与线下、体制内与体制外、精英与大众的立体网加强阵地建设。首先加强宣传思想阵地建设。深圳市委高度重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要求建好深圳学习平台,借助学习平台讲好深圳故事。第二,重视新闻舆论阵地。深圳市积极推动传

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形成了纸媒+网站+客户端+官微+自媒体+代运营”全覆盖的全媒体矩阵。第三,加强了文艺阵地建设。深圳市文联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了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咏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第四,对于网络阵地,深圳市委也非常重视。除了做大做强网上正面思想舆论,还要加强网络人士思想引导和统战工作,努力争取人心、凝聚共识。第五,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深圳重视学校思政课建设,着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思想宣传、新闻舆论、文艺创作、网络平台、学校思政五大阵地互为支点、相互放大,把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权威宣示”升级为“全民共识”,最终实现了思想可见、权威可信、价值可用和认同可持续。

(五)制定网络治理细则,压实各级责任,在铸牢主阵地中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新时代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重视互联网这个最大的变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进入新时代,深圳作为全国“最互联网城市”,微信公众号占全国一成多,属地网站占全省四成,运营App占全省一半以上,网络管理难度大,意识形态风险因素多。针对这种情况,深圳市委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一是制定了《<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分工方案》《深圳市<党委(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督查和通报办法>实施细则》等制度。二是积极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让主流价值领航网络,把优质文化送到指尖、传到心间,汇聚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三是深入开展“清朗”等系列专项行动,从严从实管好各类阵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四是针对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深圳市委网信办组织召开属地平台算法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议,推动算法应用向上向善。总之,深圳用制度笼子、内容放大、专项治理、技术阀门的协同,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最大增量。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深圳实践特点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深圳实践凸显了三个结合特征,即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结合,风险防控与价值引领结合,本土传承与国际传播结合。

(一)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结合

从刚性约束的角度来看,深圳为了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除了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等党内法规和文件外,还从自身实际出发制定了《深圳市党委(党组)落实相关工作的分工方案》、实施方案等。这些制度明确了深圳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压实了深圳各级党委(党组)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具体领导责任。在柔性引导方面,深圳市各级各类讲师团深入街道、社区一线开展的灵活多样的理论宣讲、深圳市多单位参与的关爱行动、“@深圳一民意速办”平台等,都是深圳以柔性方式推进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具体表现。这些柔性引导措施不仅增强了普通民众对党的理论的直观认识和深刻感悟,还通过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二)风险防控与价值引领结合

守好、筑牢意识形态南大门,深圳有着强烈的风险防控意识。面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深圳面临的超大城市治理风险传导、制度博弈风险、社会思潮多元风险、网络空间治理风险等,深圳市委宣传部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要求各个部门定期召开意识形态分析研判会,完善意识形态风险分析研判机制,开展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方面的业务培训,提升队伍的专业水平等。在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同时,深圳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如前所述,深圳通过主题宣讲、新媒体传播、文艺作品等多方面的举措,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三)本土传承与国际传播结合

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只有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才能契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最终得到民众的拥护和认同。深圳在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具体实践中,深入挖掘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等本土资源,打造出了甘坑客家小镇、大田匠作文化村、深圳原创舞剧《咏春》等文化精品。在岭南文化的传承和浸染中,受众体悟到中华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兼济天下的精神内核,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追求。另外,深圳还把《咏春》带出国门,在新加坡、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巡演,以市场化语言、国际化表达、柔性化方式,生动讲述着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深圳故事。

结语

总之,新时代深圳中国共产党人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思想、阵地、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久久为功。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将继续发挥其先行先试的优势,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不断探索创新,为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1.
- [2]寇晓燕.网络意识形态算法风险的治理进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3):203-211.
- [3]代金平,覃杨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应对[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01-110.
- [4]林捷兴.市级领导班子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开班[N].深圳特区报,2023-4-23(A1).
-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
- [6]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 and 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97.
- [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66.
- [8]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28.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henzhen in the New Era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DU Fang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Abstract: Shenzhen is located in the “two frontiers”, which is the “intersection” in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intersection” in culture, and the “confront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s leading demonstration are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response to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Shenzhen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henzhen has implemented comprehensive policies and coordinated multiple measures, starting from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theoretical armament, value shaping, battlefield construction, and network governance,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leadership by the Party in Shenzhen in the new era highlight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top-level design and grassroots innovation, rigid constraints and flexible guidance, risk prevention and value guidance, and local inheritance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new era; Shenzhen; risks and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范新菊)

(上接第119页)

[2]张渭莲,段宏振.东周赵国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1).

[3]白立超,白志伟.论赵武灵王“胡服”改制的本质及影响——兼论战国中期骑射与赵国的关系[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2).

[4]岳音.非遗“文化空间”视域下的曲阜祭孔乐舞大典探论[J].山东社会科学,2024(10).

[5]李博雅.“活化”语境下唐妞的诞生、成长与未来[J].中国博物馆,2019(4).

Exploration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Zhao Culture Based on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ang Dynasty Culture

ZHAO Li-qiang¹, WEI Ling-ling²

(1. Handan University, Handan Hebei 056000; 2.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culture, Zhao culture’s spirit of “innovation, integr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pragmatism” still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Zhao culture, and discovers that it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re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carriers of inheritance, monotonous forms of dissemination,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weak regional coordination. By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Tang cul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solu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material heritage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literature”, innovating the dissemination mode of “symbols + scenarios + digital”, developing the integrated industrial path of “tourism + cultural creativity + film and television”, constructing a complete education system of “in-school + out-of-school”, and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linkag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 enterprise + society”,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contemporary revival of Zhao culture.

Key words: Zhao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Confucian culture; Tang culture

(责任编辑:桂彬彬)